

梁启超与韩国近代启蒙思想

山东大学 牛林杰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与其师康有为积极主张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新小说》杂志。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是推动中国近代启蒙主义与小说艺术相结合的开山匠人,他在政治、文化、学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他的启蒙思想、政治理论、文学作品、翻译作品不仅对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还被广泛地介绍到20世纪初的韩国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梁启超著述在韩国的传播

梁启超第一次被介绍到韩国是在1897年,这一年2月15日的《大朝鲜独立协会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清国形势可悲》的文章,文章介绍了梁启超在上海主办《时务报》的情况和他的政治思想。此后梁启超的社会活动、政治论说、文学理论和作品不断被介绍到韩国,对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同年10月在横滨

创办了《清议报》。12月23日梁启超在该报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文中他高度评价了小说的社会作用。此外《清议报》还广泛介绍了西方的一些革命家、思想家及其新的学说，积极宣传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自治等思想，反对封建伦理道德。韩国的新闻界一直密切关注着《清议报》，被称为韩国近代启蒙报刊的《皇城新闻》曾于1899年初在外报栏专门介绍了梁启超和《清议报》的情况：

客岁12月23日，滞留横滨之清国人发行了《清议报》创刊号，据报导曾任上海《时务报》主编的梁启超氏发表了“支那哲学新论”和“清国政变始末”两篇论文……《清议报》痛论西东之时局，内警大清四百兆氏人之惰眠，外瞻东邦诸识者之教导。^①

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杂志，并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一系列著名的文章，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梁启超所创办的这些报刊和杂志当时就直接传入了韩国，据张朋园先生的考证，《清议报》的发行量最大时超过了一万份，在国内外的38个代理发行销售点中，韩国的京城（今首尔）和仁川就各有一个。另外《新民丛报》的97个代理发行销售点中，韩国的仁川也有一个。^②《新小说》作为《新民丛报》的姊妹刊物也和《新民丛报》一起传到了韩国。

1903年梁启超将其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发表的文章结集为《饮冰室文集》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文集一出版很快就传到了韩国，经韩国的爱国启蒙思想家和作家们的积极介绍，梁启超的著述被刊载于各种出版物。

通过梁启超著述在近代韩国的传播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对

当时韩国社会的影响力之大。但这仍不能说是梁启超影响的全部,只能说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以及《饮冰室文集》和部分单行本像《越南亡国史》、《中国魂》、《新民说》等梁启超的原版著作都直接传入了韩国,而韩国的近代文人精通汉文,他们能够直接阅读梁启超的原著,从中汲取营养。和当时报刊杂志上的介绍相比,在他们的近代启蒙思想形成过程中通过梁启超的原著受到的影响更大,而这方面的影响是难以用数字来统计的。

从被介绍到韩国的梁启超著述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韩国文人在介绍梁启超的时候始终围绕着爱国和启蒙两大主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韩国的近代社会和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大致相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势力渐渐介入韩国,到1905年日本在韩国实行了总督统治,并终于在1910年吞并了韩国。在日本一步步吞并韩国的过程中,韩国的仁人志士进行了坚决的抗争。而在韩国近代知识分子苦苦探索救国之路的关键时刻,梁启超的爱国启蒙思想成了他们宝贵的思想武器。他们通过介绍梁启超的著述,积极提倡爱国精神,宣扬各国的救国英雄,传播西方近代文化以开启民智。

二、梁启超与韩国近代启蒙思想家

在近代韩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有玄采、申采浩、朴殷植、张志渊、安昌浩等。他们积极接受西方的启蒙思想,推动近代报纸、杂志和图书的发行,以此来宣传和普及爱国启蒙运动,从而实现民族独立和自强。通过前面梁启超著述在韩国的传播情况,我们不难看出韩国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与梁启超有着密切的关系。

①玄采

玄采(1856-1925),号白堂,开化期“主权恢复”的倡导者和先驱者,在外文书籍的翻译和出版方面贡献尤为突出。玄采生于哲宗七年,原籍汉城,父亲译参奉济万,母亲郑氏。出生于译科门第的玄采,从小习读汉文,18岁弱冠及第。及第之后,曾一度为官,后于1896年被任命为学部编辑局委员。此后,开始专注于外文书籍的翻译。崔南善曾在《朝鲜历史》中对玄采作过高度评价,“乙未以后,生学部编辑局,玄采从事纂译时务新书,独占著述界,撰述光武乾隆际学校教科书之大半”。1900年,玄采翻译出版了梁启超的《清国戊戌政变记》,这是韩国最早的梁启超著作的译本。这时《饮冰室文集》还没有出版,所以,当时韩国的知识界主要是通过《清议报》了解梁启超的思想的。《清国戊戌政变记》使韩国民众了解到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形势,从而提高了其对日本的警惕之心。同时,对于韩国人认识梁启超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乙巳条约签订之后,玄采辞掉了学府的职位,于1906年开始在普成社从事出版工作。当时,日本的侵略日益加剧,韩国社会内部要求独立自强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玄采翻译出版了梁启超的《越南亡国史》,以鼓舞民众的爱国心。同时,他还把《越南亡国史》收录在他的代表作《幼年必读》中,用来教化民众。此后,玄采又在桂洞独自经营书店,维持生计,后来书店发展成为“玄采家”出版社,仅图书就出版了30余种。其中主要的图书有《东国史略》、《法兰西新史》、《幼年必读》、《东西洋历史》、《日本史记》、《普法战记》等。从这些书目可以看出,玄采是一位精于时局的启蒙思想家。他所主导的外国图书翻译和出版为韩国的近代启蒙运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玄采编译出版的梁启超的《越南亡国史》成为近代韩国影响最大的启蒙图书

之一。

②申采浩

申采浩(1880-1936),号丹斋,笔名无涯生,是韩国近代最为著名的爱国启蒙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1880年出生于忠清北道清州的儒家家庭,6岁入私塾,10岁时已通读儒家经典,20岁便取得了成均馆的博士资格。

复杂的历史变革使年轻的儒生申采浩积极投身于民族独立运动。1902年,申采浩发表了《抗日声讨文》一文,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爱国文章。以此为契机,他开始积极投身于舆论界,在《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大韩协会月报》、《家庭杂志》、《少年》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社论。

申采浩由评论家、史学家、思想家,最终成为近代著名的爱国文学家。他的思想受梁启超影响很大。在文学思想方面,他借鉴梁启超的小说社会效用论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他在《小说家的趋势》一文中指出:“小说引导国民强盛,国民则强盛;引导国民软弱,国民则软弱;引导国民正直,国民则正直;引导国民邪恶,国民则邪恶”。^③在这里申采浩充分肯定了小说的社会效用,这和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的效用论小说观是一致的。在《近今国文小说著者的注意》一文中申采浩又说:“呜呼!能助英雄豪杰之躯体,能使天下之事业始于妇孺走卒等下层社会,能具转移人心之能力者,小说也。然若小说多为萎靡淫荡之作,其国民亦会受此感化。故西儒云:‘小说为国民之魂’”。^④在这里申采浩在进一步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的同时,还引用了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提到的“小说为国民之魂”。在同一篇文章中,申采浩还提出了小说的“熏陶浸染”的作用,这显然是受了梁启超提出的“熏浸刺提”的影响。众所周知,“熏浸刺提”是梁启超关于小说的文艺美学特征的重要见解,他在《小

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从审美主体的心理活动入手,具体分析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力量。申采浩所提出的“熏陶浸染”在内容上和梁启超的见解基本一致,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两人之间的影响关系是多么的密切了。

为唤起民众的爱国心,申采浩还翻译出版了梁启超的《伊太利建国三杰传》一书。《伊太利建国三杰传》虽然是一部小说,但它对于爱国主义的宣传,确实十分有效。鉴于此,继翻译《伊太利建国三杰传》之后,申采浩又直接创作了《乙支文德》(1908)、《李舜臣传》(1908)、《崔督统传》(1910)等历史传记小说。金台俊曾称赞他说:“当时,成均馆博士申采浩氏创作《乙支文德》、《李舜臣传》等历史小说,开拓新生面,实为氏之独创,隆盛之政治思想与国家观念之反映,时代之产物。”而他的这些历史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梁启超的文学理论及其历史小说作品影响。

③ 朴殷植

朴殷植(1859-1925),字圣七,号谦谷、白严,开化期著名的独立运动家、舆论家、学者。1898年,儒生朴殷植受独立协会的影响,开始由性理学和卫正斥邪思想转向开化思想。

1904年,《大韩每日申报》创刊发行,朴殷植被聘任为主要执笔人。以此为契机,朴殷植正式转变成了开化思想家。他辛辣的批判儒家思想和卫正斥邪思想,并强调开化思想和新文明对于实现民族自强的重要性。1906年,大韩自强会成立后,朴殷植十分活跃,在《大韩自强月报》上发表了大量爱国启蒙性质的社论。同年,他还组织成立了西友学会,并担任会刊《西友》的主笔。朴殷植发表大量论评,宣传强调新教育救国思想、实业救国思想、社会风气改革思想、大同思想等爱国主义思想,并积极推动爱国主义运动的发展。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朴殷植在当时的思想界和运动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10年,韩日和邦以后,朴殷植的著作被日本当局宣布为禁书。为了保存韩国民族的历史和国魂,朴殷植于1911年流亡当时的满洲。此间,他的主要著作有《东明圣王实记》、《渤海太祖建国志》、《梦拜金太祖》、《渊概苏文传》、《大东古代史论》等。

值得注意的是,朴殷植曾于1914年,应中国友人之邀,在香港担任中国杂志《香江》的主笔。这一时期,他与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康绍仪、景梅九等都有很深的交往。朴殷植虽然是在1914年才认识梁启超,但早在此之前,他就已经翻译出版过梁启超的许多著作,如《学校总论》、《爱国论》、《论师范》、《论幼学》等,并且一直研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清议报》、《新民从报》等。所以朴殷植的启蒙思想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

④张志渊

张志渊(1864-1921),号韦庵,韩国近代爱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从开港到韩日合邦,张志渊亲身体验了历史的剧变,并由儒生迅速转变为启蒙思想家。亡国的悲剧使张志渊深切地认识到新思想和新文化的重要性。为救国图强,张志渊积极投身于社会启蒙运动中。

张志渊出生于庆尚道尚州,6岁开始学习汉文,15岁已熟读经史,31岁任职史礼所,后任内部主事。但很快于1898年他便辞掉了内部主事之职。至此,张志渊的人生一直是典型的儒生之路。1898年,张志渊任《时事丛报》社主笔。同年9月,任《皇城新闻》社主笔,开始从事舆论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此,他开始通过发表文章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启蒙民众,救国自强。乙丑条约签订以后,因发表《是日也放声大哭》一文,而被迫退出舆论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大韩自强会的活动。

作为舆论家，张志渊不仅广泛接触到梁启超发行的《清议报》、《新民从报》及其著作《饮冰室文集》，他还直接翻译出版了梁启超的著作《中国魂》。因此，他的文章和思想也受到了梁启超很大的影响。

《中国魂》分上下两卷。上卷收录了《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过渡时代论》、《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等，下卷收录了《论中国与欧洲国体之异同》、《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论中国今日当以竞争术和平》、《排外平议》、《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等。这本书中收录的文章逐一在《清议报》和《新民业报》上发表，且大部分再次收录到1902年出版的《饮冰室文集》中。《中国魂》反映了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国家思想、改良主义思想等。

1908年5月张志渊全文翻译了梁启超的《中国魂》，由大邱石宝铺发行。张志渊在译本的第一页插入“贬世”二字，与当时中国流行的“醒世”、“警世”如出一辙。张志渊的译本还附有尹瑛燮的跋。

惟我与清兮接壤而并立。其兴其衰兮从古影响而相及，猗其二万里之神州兮皇帝圣族文明之所翕。夫何近代之侵削兮，三百年河流滄滄。忆近代之清淡兮既无救于国家之急，况宋氏之误导兮其学向僻而且固执。吁彼禹域兮尚因循子积习。盖我箕疆兮亦余波之添湿。抱卷长读兮不觉同遇同情而悲泣。呜呼同遇兮其骏马之如繁。呜呼同情兮及此春雷而共振蛰。大韩隆熙二年二月，止堂尹瑛燮谨题。^⑤

尹瑛燮在跋中指出，中韩接壤并立，自古中国的兴衰对韩国

影响很大。他对近代中国遭受列强的侵略而表示哀叹。他希望此书能像春雷一样惊醒韩国国民,唤起他们的爱国心。

梁启超的《中国魂》传入韩国后,引起了很大反响。韩国知识分子模仿“中国魂”一语,创造了“朝鲜魂”、“韩国魂”、“国民的魂”等用语,并很快成为各新闻杂志上的流行语。

三、梁启超及其《越南亡国史》

《越南亡国史》是在近代韩国影响最大的梁启超的著作之一。该书在1905年出版后,立即传到韩国,并受到韩国近代爱国启蒙思想家们的热烈欢迎。1906年玄采首先把《越南亡国史》翻译成了韩汉混用的韩文,由汉城普成社出版发行,并于1907年再版。1907年,周时经又将《越南亡国史》翻译成了纯韩文(即不夹杂汉字的韩文),进一步扩大了该书的影响。同年李相益再次将《越南亡国史》翻译成韩文,并收录于当时非常普及的学校教科书《幼年必读》中,使该书成了家喻户晓的爱国启蒙教材。

《越南亡国史》的创作起因于梁启超和越南亡命客巢南子(越南民族运动家潘佩珠)的对话。韩国语版本的《越南亡国史》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记越南亡人之言》,第二部分是《越南亡国史》,第三部分则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梁启超的《日本之朝鲜》、《灭国新法论》。该书之所以在韩国多次再版深受韩国读者的欢迎,主要是因为它唤起了人们的爱国精神和救国热情。《越南亡国史》写的虽然是越南的亡国史,但韩国读者却从中读到了韩国的亡国史。1905年日本在韩国实行总督统治后,韩国可以说已经是名存实亡了。爱国知识分子们为唤起人民的救国热情,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纷纷著书立说。而此时梁启超发表的《越南亡国史》正好满足了韩国社会的这一需要,透过越南的

亡国历史,韩国读者看到了当时韩国灭亡的现实。再加上梁启超在书中还直言及韩国,他在《记越南亡人之言》的结尾指出:“夫宁不见一年来日本之所以待朝鲜耶。今战事且未集,而第二越南之现象,已将见矣”^⑥。指韩国将成为“第二越南”,这一预言性的判断,对当时韩国人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鲁益亨在周时经翻译的《越南亡国史》序中指出:“越南亡国的史实很值得我们反思。现在我国的人民不论男女老少都应该了解这件事情并提高警惕,关心时局的变化,认真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从患乱中保存我们的生命。”金素云也曾回忆说:“一本薄薄的《越南亡国史》适时地详细地教我懂得了什么是侵略、民族的自由具有怎样的意义。书中的‘越南’两字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自己国家的名字”^⑦。正是因为这样,《越南亡国史》一发行就被介绍到韩国,并且成了当时家喻户晓、影响最大的爱国书籍之一。

四、结 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韩国,正处于日本和欧美势力介入、西方文化大量涌入的时期,而当时的中国却处于列强侵扰、国运衰落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形下,韩国的近代文人却选择了梁启超的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难解的选择。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梁启超与韩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关系引起了当代学者们极大的关注和兴趣。

梁启超对韩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不是单纯的、直线式的影响,而是一种复合式的影响。这里既有直接的影响,又有间接的影响。比如,对韩国近代文学的影响,梁启超并非是为了文学而从事文学的文人,他在思想、文化、学术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在对韩国文学的影响中,除了他的文学理论

和作品的直接影响外,通过他的有关爱国、启蒙方面的论述给韩国近代文学带来的影响更深远。在多种社会思潮混在的变革期,作家们追求的目标不同,选择的视角各异,对于某种思想或文化,有的人积极接受,有的人是在大的社会背景下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的。

此外,尽管梁启超和他的著述对韩国的近代启蒙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被翻译成韩国语的梁氏作品却比日本方面的要少。其间一部分韩国学者只根据当时翻译作品的数量强调日本方面的影响,他们忽视了具有很高汉文水平的韩国知识分子可以直接阅读中国原典的事实。因此只根据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理解梁启超与韩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关系是不全面的。更何况在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时,梁启超选择的视角和日本的视角是很不同的,梁启超以介绍宣扬救国运动、自立独立精神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的伟人传记或具有进步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潮的新小说为主,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潮流和需要。而客观上这又和正在进行抗日、反封建、反殖民运动的韩国的社会状况相符合,因此梁启超受到了当时韩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这一点在研究近代中日韩文学关系时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本。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1964年。

李在铉:《韩国开化期小说研究》,汉城,一潮阁,1968年。

韩武熙:《丹斋和任公的文学思想》,《文学研究》第二辑,首尔,1977年。

叶乾坤:《梁启超与旧韩末文学》,首尔,法典出版社,1980年。

李明宰:〈梁启超对韩国新文学的影响〉,《中央大学校论文集》,首尔,1980年。

成贤子:《晚清小说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梨花女子大学博士论文,首尔,1984年。

宋贤镐:〈爱国启蒙小说的形成与梁启超的作用〉,《人文论丛》6,亚洲大学校,1995年。

牛林杰:《韩国开化期文学与梁启超》,博而精,首尔,2002年。

注 释:

①《皇城新闻》,光武3年1月13日。

②张朋远:《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湾“中央研究院”,1964。

③《丹斋申采浩全集》别集,丹斋申采浩先生纪念事业会,1995年, P81.

④《丹斋申采浩全集》下集,丹斋申采浩先生纪念事业会,1995年, P17-18.

⑤梁启超:《中国魂》,张志渊译,大邱石宝铺,1908年。

⑥本文所引梁启超文章著作除注明者外,均出自《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本。

⑦《金素云随笔集》,亚成出版社,汉城,1983年,第28页。